

从“直译”到“译释”

——张东荪对西方哲学新名词的译介方式

左 玉河

张东荪是近代中国著名哲学家，从清末留学日本起，接触并介绍西方哲学，或从日文，或从英文翻译西方哲学著作。其译介西方哲学著作（含哲学新名词），经历了一个从“直译”到“义译”，再从“义译”到“译释”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在张氏翻译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代表作《创化论》时得到充分体现。这种从“直译”到“译释”的变化，一方面表明中国学人对西方哲学的介绍的深化，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学人开始从介绍西方哲学向创建中国新哲学转变。

西方“philosophy”一词，明清之际开始传入中国。鸦片战后，中西学者在介绍西方学校制度时，将它译为“智学”或“理学”。汉语“哲学”一词，是从日本转译而来的。1874年，日本哲学家西周出版了《百一新论》，将“science”和“philosophy”分别译为“科学”和“哲学”，这两个术语逐渐为世人沿用。1877年，驻日参赞黄遵宪撰成《日本国志》，最早引入“哲学”术语。随后，“哲学”与“穷理学”、“智学”、“理学”词等并用，直到20世纪初取代“理学”等名词而为中国学界通用。清末介绍到中国的哲学著作，多为日本学者撰写的，其中重要的有井上圆了著《哲学要领》、《哲学原理》、《哲学微言》和《妖怪学讲义》，姊崎正治著《宗教哲学》、藤井健次郎著《哲学泛论》等。

1905年，张东荪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哲学。次年11月，他在《教育》杂志第2号上发表阅读西方各种哲学流派关于认识问题的见解后所写的读书笔记——《真理篇》。在该文中，他重点介绍了当时美国以詹姆士、席勒等人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思潮，对实用主义的真理观进行了初步的理解和介绍。采纳了日本人翻译的许多新名词（新概念），如“主观”、“认知”、“推理”、“思想”、“联想”、“注意”、“想象”、“意”、“情”等，并对这些哲学名词的内涵作了较为深刻的理解。这种情况说明，张东荪从接触西方哲学之始，便敏感地注意到了西方自康德以来的认识论传统，对康德的“先天判断”、“悟性”等也有所了解。

此时张东荪对西方哲学的介绍，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是直接翻译西方哲学原著；二是将西方哲学思想用自己理解的语言来表述，并且加上了自己对此学说的评价。前者无疑是一种西方思想的“贩卖”，是中国人在开始接触和介绍西方思想时将普遍采取的不可避免的方式；后者则是更高一层的介绍。张氏在开始接触西方哲学之初，试图用后种方式来介绍西方学说，表明张东荪有着一种强烈的“说自己的话”的欲望。这两种介绍方法——直译与义译，成为张东荪日后大规模介绍西方哲学的主要方法，而这种翻译和介绍方法，在张氏随后翻译柏格森的《创化论》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柏格森是20世纪法国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被称为“生命哲学”，其主要著作作为《创化论》、《时间与自由意志》和《物质与记忆》等。1917年，张东荪着手翻译《创化论》，1918年1月3日开始，该书译文在《时事新报》上连载；1922年，将它纳入

“尚志学会”丛书出版。张氏在该书出版时写的《译言》中，除了介绍柏格森的生平事迹外，重点说明了三件事：一是名辞，二是体裁，三是所感。这部书的原著为法文，张氏不懂法文，故采用了美国密启尔的英译本，从英文直接翻译。该书当时已经有日本人金子、桂井两人翻译的日译本，故张氏从英译本直译，参照日译本。

从名辞上看，张东荪将书名“Creative Evolution”译为“创化论”，是经过反复斟酌和推敲后的结果。

日本人将 Creative Evolution 译为“创造的进化”。张氏认为，“的”字是口语，并不准确；通篇不用口语，故不用日译名词。有人建议改为“创造之进化”，张认为这样若译成英文，则为 The Evolution of the Creative，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有人建议译为“创造进化论”，若以此译成英文，则有 to creative the Evolution 之误，故张氏“毅然决然用今名”。他解释说：以“创”即创造，“化”即进化。日本人喜欢用“叠字”（缀字），如国，称为“国家”，实则仅一“国”字，与义亦足。“创造”固无异乎“创”；“进化”亦有“化”即足，不用再加“进”于其上，创中已经兼含“进”之义。¹故将 Creative Evolution，根据意义翻译为简明的“创化论”。这个名词是张东荪创造的新词。这一新词在当时也为人们接受并使用。

通过翻译柏格森的《创化论》，张东荪形成了翻译西文名词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清末民初在西方新名词的汉译问题上，有三大流派，一是东译派，二是严复派，三是译音派。他对三者都不满意。1、东译是可以采用的，但决不可无例外；2、严复派的自创名词非不可为，但必局限在例外上；3、音译是可以的，但不能过多。“故三者宜各有限度。”

这个限度如何把握？“1、于东译，当充量而用之。至其与汉文无训诂相同者，则万不可用。如积极、消极、肯定、否定，其辞虽不雅，然于文义尚可通，似可袭用。若夫场合、持续、取缔、取引，真不可解矣，不可用。2、于自创，则宜少，非不得已，不自立新名。3、于译音，尤然，苟非万无可译时，不可译音也。”²张东荪翻译《创化论》，就是按照这样的翻译思想进行的。不仅如此，此后张东荪翻译西方著作，基本上也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按照上述翻译思路或方法，或对于名辞的翻译处理方法，张氏在翻译《创化论》时，自创的哲学新名词不多，但有两个名词是新创的。一是 Duration，日本人译为“连续”，张氏改译为“绵延”。其改译原因为：“连续”是说二物之相接触，“绵延”是指一物的自然延长，所以日本人的译名不准确，所以不能不弃“连续”一词而改译为“绵延”，这样才更合理、更准确；二是 Order，日本人将它译为“秩序”，张氏改译为“理”。其改译的原因为：“秩序”是指先后次序，“理”则是指条规，不限于先后，所以不能不弃“秩序”一词而改译为“理”字。

在其他一些“哲学”专用名词的翻译上，张氏采用了清末旧译，如将 Protoplasm 不译为“原型质”而译为“底质”，是用严复的译名；如 Metaphysics 不译为“纯正哲学”而译为“玄学”，是采用了蔡元培的译名；他认为“意识”一词是佛家唯识论上的特别名词，不可乱用，故将 Consciousness 不译为“意识”，而翻译为“心意”或“心”。这些均是采用旧译名。

在译文的体裁上，张氏开始从“直译”转向“译释”。译文的体裁大致有两种方法，一是直译，二是义译。张氏开始翻译该书时，趋向于“直译”，只讲求语法上的准确。但当他按照此法翻译完后，发现很多地方在意义上读不通，有不少语义令人费解之处。于是，张氏便将这些译稿全部废弃，重新按照“义译”来翻译。但按照“义译”翻译之后，他发现这样一来，意思固然很通达，但却存在着与原文有较大出入的问题。他觉得直译与义译“无

¹ 张东荪：《创化论·译言》，第2页，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² 张东荪：《创化论·译言》，第3页，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法两全”。张氏比较了日译英文后指出，两种语言在翻译过程中在语气与结构等方面均存在着“不类”现象，说明开始时既无所谓“直译”，也无所谓“义译”，两者仅仅是程度上不同而已。“人取其想念类之较肖者”，名为“直译”；“而其相似之较远者”，谓“义译”。故他断定：“直译与义译，于性质上绝非二物，不过程度之等差已耳。”³

晚清以来人们在翻译西文名词时，注意所谓“信、达、雅”，但人们实际上很难做到。或者偏于“信”，或偏于“达”，或偏于“雅”。偏于信者，不免有“费解之句”；偏于雅者，大都“辞坚义晦”。张氏认为，严复是“专尚雅者也”，除《天演论》外，大都“辞坚义晦”，难以为一般民众接受；社会上很多人“专尚信者”，这类译本费解之处太多，同样难以为一般民众接受。有鉴于此，张东荪在两者之外，偏重于“达”，即在直译（偏重信）和义译（偏重雅）之外，采取“译释”趋向。对此，他解释说：“吾今独于此二趋向外，另取其一，曰专以达为主。有时为达故，虽稍亏于信雅，亦非所计，因名曰译释。”⁴

张东荪的这种“译释”法，师法于日本人的“解说体”。偏达而不偏信的倾向，似乎是一种不严肃的态度，但实际上，张氏是在基本上“信”的基础上，强调“达”的。同时，他所以会注重“达”而不注重“信”，也是其翻译哲学原著的目的使然。

在张氏看来，翻译外国哲学著作，是为了向国人介绍其思想，是为了使那些不能读原著的国人，能够了解外国哲学家学说的内容和意义。这样，译书的主要目的是使读者领悟外国思想的精义所在，而不是文辞和语言。所以，必须将“达”作为译书的首要目标。对此，张氏作了解释：“夫吾人之译书，岂不曰介绍其思想于现在之邦人乎？则必求不能读原书之邦人而能了解无遗。不然者，使其读原书可焉，何必多此一举耶？故吾以达为第一义。质言之，即于达信之间，宁重达而轻信，至于雅则附属于达中可矣。”⁵

何为“达”？张东荪将它释为“义理之显豁也”。他一再强调：“人之读是书者，本求知其所论之理，非玩其所撰之文（但文学书又当别论）。故义理之显豁较诸语气之相肖，尤为重且要也。”哲学本来就是讲求“义理”的，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目的就是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思想，所以必须注意“达”，而不是“信”和“雅”。

张氏解释说，翻译哲学著作不译“信”为第一义，固然由于自己“译才之短”所限，但更重要是由于中国文体“天然之制限”所致。他看到了日译汉语新名词对中国文体的影响，也看到了中国现代新问题出现的趋势，并坚信“此后中文必变”，且“其变必为接近于欧文”，但中国文体上的变化决非一时之事，更非一人之力，“必渐积其自然趋势而始能成熟，不可强为。”⁶若强为之，更使人费解而已。在中国文体正在变化过程中，不能不受目前“现行之文体”限制，因此对哲学原著采取“译释法”，就是最为合理的方法。

张东荪的这种翻译方式颇值得重视。正是抱有这样的态度，张氏翻译西方哲学著作偏重于介绍西方著作中的义理；他在介绍西方各派学说时，偏重于把握其思想的真谛，而不是文字上的通畅。这便逐步形成了张氏介绍西方哲学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注重“义译”而不是“直译”；注重“阐释和解说”，而不局限于“贩卖”式的介绍；在介绍西方哲学思想时，总是根据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加以阐述，从而使张氏对西方各派哲学有较深刻的领悟和较准确的把握，使其对西方哲学的介绍不仅具有一定的广度，而且具有很扎实的深度。

³ 张东荪：《创化论·译言》，第4页，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⁴ 张东荪：《创化论·译言》，第5页，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⁵ 张东荪：《创化论·译言》，第6页，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⁶ 张东荪：《创化论·译言》，第7页，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这种介绍的方式，是日后张东荪介绍西方哲学的主要方式。在后来所写的介绍性著作中，张氏进一步说明了自己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与当时人们的介绍不同处，或者说是高明于当时人们的地方。这正是张氏介绍西方哲学的特色。依据原著，务求弄通，有所体会和领悟，向哲学界介绍的是自己对于西方哲学家思想的理解，便于人们把握西方哲学的精义所在。

对西方哲学的“译释”法，决定了张东荪必然会在介绍过程中提出自己的研究心得，逐步形成自己的新哲学。一面介绍西方哲学，一面建构新哲学体系，两者相辅相承。从介绍西方哲学中常常能够有所心得，引发新意，是张氏成为五四以后第一个创建新哲学体系者的重要原因。